

中国  
对外条约辞典  
(1689~1949)

吉林教育出版社

## 前 言

自古以来，中国同周边的亚洲国家朝鲜、日本、缅甸、印度、暹罗等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如周代的“箕子朝鲜”；穆王西巡；秦代徐福东渡；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隋、唐时期的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遣唐使来华；宋、元时期的马可·波罗来华；明代的郑和下西洋等等。这些中、外友好使者促进了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通过这种交流，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成果传入其他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同时，在交流中中国也广泛地吸收和消化了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与文化成果，使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辉煌。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非洲、亚洲、美洲新航线的开辟，把各大洲不同国家和民族联系成一个整体。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开始在全球急剧扩张殖民势力，逐步形成了近代的世界经济市场和国际关系格局。从此，地球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已不再具有个别、孤立的性质，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从16世纪以后，中外交往关系的平等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欧洲一些海盜式的殖民者、商人陆续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他们开拓万里波涛、远航中国的第一个动机，也是最直接的动机就是寻找黄金、掠夺财富。在绵长的西方船队中最早的是葡萄牙人（1516年），然后是荷兰人（1601年）、英国人（1637年）、法国人（1660年）、美国人（1784年）。俄国人从海路到达中国的时间虽晚，但在陆路却并不落后。它在征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之后，在1643年又把侵略触角伸

向了肥沃的黑龙江流域。这些欧洲人不仅从事掠夺和欺诈性的贸易，而且有着强烈的殖民倾向。葡萄牙来到中国后，杀人抢船，剿劫行旅，并在1553年以欺骗和贿赂手段窃据了澳门。西班牙人曾两度进攻台湾，并残酷屠杀菲律宾等地的华侨。荷兰人侵占台湾，实行殖民统治达38年之久。英国人首次到达广州，就炮击虎门，其强盗行径令人发指。俄国则悍然入侵我国黑龙江。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活动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强盗行径都受到明政府的打击，民族英雄郑成功在1662年率师东渡，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清王朝建立后，在1685年、1686年两次出兵抗击俄国对中国北部疆土的武装侵略，迫使俄国在1689年9月7日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界约》，在平等基础上划分了中国东段边界。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界约》也是一个平等条约。1727年，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布连斯奇界约》和《阿巴哈依图界约》，对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的商务关系作了规定，使俄国的侵略活动受到了阻拒。中俄边境保持了150年的和平。西方国家对华侵略活动严重损害和恶化了平等的中外关系。但是，也应该看到，西方商人、传教士在对中国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渗透同时，也从域外带来了新鲜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统治者若能顺应历史潮流，勇敢地接受西方国家的挑战，抓住历史赋予的这一契机，除旧布新，中国是本应步入世界强国之林的。但是，昏庸的最高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域外剧变的西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化外蛮夷的水平上，夜郎自大，开始出现闭关倾向。清政府把渐次出现的反清起义看成是中外勾结的结果，严厉限制中国商船进行远洋贸易。1757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对外商只开广州一口。次年，又颁布实施了《防范外夷条规》。至此，“闭关”政策正式形成。

18世纪后，正当中国国势江河日下的时候，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经济繁荣，国势蒸蒸日上。英国在产业革命后，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利欲熏心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十分垂涎广阔的中国市场，但其产品在中国销售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是清政府对外商

的种种限制；二是对华贸易的逆差。由于英国工业品受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一直销路不佳，而对英国丝茶的需求却不断增大。徘徊在中国市场大门之外而不得其入的英国商人为平衡中英贸易想出了一个卑鄙的办法——向中国销售鸦片。尽管清政府严令禁止鸦片贸易，但是黑暗的吏制使禁烟法令形同废纸，其结果是屡禁不止，越禁越盛，导致白银外流，银价猛涨，经济萎缩。规模日益庞大的吸食者使民族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英国的鸦片贩子却大发横财。英国资产阶级追求的不仅是丰厚的利润，他们还企图把鸦片作为砸开中国的敲门砖。

面对这一系列社会危机，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决定派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这样，禁烟与输毒就成为中英之间的主要矛盾。实质上，它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虎门销烟”使英国侵略者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蓄谋已久的英国政府借机挑起了对华战争，目的在于继续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但英国政府却把战争的原因说成是英国商人受到了暴行与虐待，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索取赔偿和得到平等的待遇，这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

昏庸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英国投降。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1843年6月又签订了《中英过境税声明》；10月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勒索了巨额赔款，并强占了香港，片面获得了大量的非法权益。由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被英国的重炮轰得粉碎，一窝蜂涌进来的西方侵略者，起哄般地呼喊着自己的要求，声称要一洗被拒之门外120年的“耻辱”。首先是美国和法国乘清政府惊魂未定之际派代表恫吓、打劫，分别于1844年与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外，将英国所得到的特权包揽无遗，而且还有扩大与增加。例如，法国就得到了传教权，逼迫清政府承认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俄国利用鸦片战争的机会加紧对中国东北、西北地区扩张，1851年也与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同英法相类似的特权。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其

中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 五口通商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贸易通商，允许英国在这五口设立领事，并取消了公行，宣告了清政府闭关政策在通商制度方面已告破产。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它们的炮舰保护下，通过这些口岸直入中国内地。

2. 协定关税权。《南京条约》第10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望厦条约》则进一步规定，如果中国变更税则，要与美国领事“议允”。在协定关税的束缚下，中国海关从此失去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作用，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

3. 领事裁判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中英人民之间的诉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即英国人方面由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科罪。《望厦条约》则把领事裁判权扩大到美侨之间及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之间发生的诉讼。从而使所有在华外人都受中国法律约束，中国的司法主权亦被破坏。

4. 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第8款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各国和中国订约都群起效尤。从此任何一国所攫得的任何特权，他国即同得享受，列强之间无形中结成了侵华联合阵线，共同掠夺中国。

5. 军舰停泊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都规定，英国可以有兵舰一艘在五口停泊。《望厦条约》第32、33款则规定美国兵船不仅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而且各港口官员还要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这二款对停泊的船数和地点都未规定和限制，这样就更加扩大了外国军舰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范围。

6. 租赁土地权。《虎门条约》规定外国人可在五口租地。《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在五口：“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西方列强竟利用此款，擅自划定“居留地”。又通过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与1854年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上海，继而又在其他口岸建立了租界，侵夺中国

主权，形成国中之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半殖民地城市。

7. 海关行政管理权。1854年6月，英、法、美三国领事强迫苏松太道兼海关监督吴健章签订《上海海关协定》。规定由三国领事各派“司税”一人管理中国上海海关。这样，外国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一重要海关管理权，把上海海关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洋关”。

在英、美、法之后，其他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德国、瑞典、挪威也相继前来要求通商，分治利权，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都一概允准。从此中国封闭的大门便向资本主义世界开了一个口子。这直接刺激了清政府对外交涉机构的变化。闭关时代的清政府和外国之间向无经济的外交往来，在中外关系中，只有“藩属”对中国的定期“朝贡”，即使这种经济往来还带有浓厚的政治馈赠色彩，但还是经济性的事务。所以在清朝的中央政府体制中，一向没有专掌外交的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分掌由海道和陆路前来的“藩属”朝贡事务。清政府遇有和其他外国发生交涉时，也把这些国家一概作为“藩属”看待，如对俄国的交涉事务，向来即有理藩院掌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和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这些交涉事务和向来由礼部和理藩院掌管的“朝贡”事务，性质上绝然不同，所以只能专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南京条约》订立后，五口开放，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已无可避免。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乃有“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置，作为两广总督的兼职（1859年后改由两江总督兼任）。这说明了清政府已被迫承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同于“藩属”的关系，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掌管。但是，“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的身份，而且又是兼职，这又表明清政府的主观意识上仍未放弃其闭关思想，依旧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交涉事务，看成是临时性的。

鸦片战争在中国对外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被强迫纳入了近代世界政治格局，由于国势衰微，不得不担当与其辽阔国土极不相称的小角色，而由于对外关系的不平等性质，西方列强在华享有种种侵略特权，中国承担着被奴役的义务。清政府的外交政治正在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 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社会生活呈现出剧烈的动荡，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19世纪40至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迅猛发展要求各国政府拓宽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的商品市场。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资料，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3年仅为90万英镑。但在1842后，由于有《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对华输出商品激增，1845年竟达239.4万英镑。其他列强对华输出商品也有显著增加。但是，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却未出现那样持续发展的局面，1845年以后一直不太景气，甚至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如此，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另一方面原因，由于鸦片战争后，鸦片的大量输入掠夺了中国社会有限的白银，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又买鸦片，又买洋货，只能是此长彼消。但是，西方侵略者却认为这是中国还不够开放的结果。他们要求加强向中国内地的扩张，开辟更多的口岸，取消内地关税，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要求派公使驻京，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俄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于英、美、法列强，但它却利用地理上同中国接壤的便利条件，乘清政府鸦片战争后力量削弱的时机，对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加紧实现鲸吞我国黑龙江流域的野心。1849年，俄国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伊等乘炮舰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并将黑龙江河口湾附近北岸的两处港湾，非法命名为幸福湾和圣尼古拉湾。1850年8月，他们强占了我国黑龙江口的重镇庙街，以沙皇名字把庙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至1856年，英法与俄国之间发生了争夺“东方遗产”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败北，通过黑海南下的计划受阻，俄国开始把侵略的重心放到远东。这时，他们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黑龙江下游两岸以及江口外整个中国领海，并侵占了库页岛。与此同时，俄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了我国西部地区。1846年，俄国武装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库

克乌苏河（今苏联的卡拉塔尔河）地区。19世纪50年代，它越过伊犁河继续向南扩张，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它已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

1854年，英国在法、美两国的支持下率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利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的困境，开始了一番新的勒索。本来《南京条约》是一个政治条约，其中没有任何日后可以修订的规定。但英国公使包令却以“利益均沾”为词，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一款，提出了一个广泛的“修约”要求，包括增开口岸、长江自由通航、外人自由进入内地、废除转口税、公使驻京等。这不仅不是“稍有变通”，也不是一般的“修约”，而是重新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这种无理要求当然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英、美、法三国又重提“修约”，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和对太平天国的所谓“中立”态度，增加了清政府对他们的猜疑，担心出现一个中外联合颠覆“大清”江山的局面。同时，传统的文化中心观念与“天朝上国”的陈腐思想，也影响清政府接受近代的外交体制。他们认为，英美等国提出“公使驻京”及公使在觐见中国皇帝时用欧洲通行礼节，不三拜九叩的要求，是对大清王朝的极大侮辱。咸丰初年，清政府在外交上渐趋强硬。道光皇帝对《南京条约》的签订一直耿耿于怀，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愧对列祖列宗的事情，所以，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诏，宣布他死后不要为他立“神圣功德”碑，也不要行“郊配之礼”。这对即位的咸丰是个重大刺激。咸丰虽无雄才大略，但也想作为一番，改变道光末年外交上过份软弱的局面。咸丰执政后不久，就处罚了鸦片战争的妥协派穆彰阿、耆英，起用了坚持反侵略立场的林则徐，采取了“坚持定约、杜绝妄求”的对外政策，支持广州等地的反进城斗争与反租地斗争。清政府虽然拒绝了“修约”要求，但却没有抵抗西方列强的勇气和信心，把主要精力却投放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所谓“内乱”上。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在谈判无效后，英、法便以“亚罗号”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这次战争同鸦片战争一样，也是西方列强企图以武力扩大他们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取得

更多的特权，可以视为鸦片战争的继续。因此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再次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清政府被迫屈辱求和。1858年6月，谈判开始。英国代表骄横要挟，俄、美公使则扮演“调停人”角色，从中渔利。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施展其奸诈手段，诱逼清政府首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规定两国“从前未经订明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接着，美国公使列卫廉于6月18日逼签了《中美天津条约》。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也分别签字。11月，清政府又分别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几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 各国公使常驻北京；2. 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个城镇为通商口岸；3. 英法等国入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4. 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5. 中国分别向英国、法国赔款银400万、200万两；6. 鸦片贸易合法化；7. 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确立了外国税务司统治中国海关的制度；8. 洋货只须交纳5%的母口税和2.5%的子口税便可行销内地。《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英、法侵略者并不满足于在《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又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中国勒索更多的特权。清政府对条约也很不满意，特别认为“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咸丰深恐外国公使驻京会损害自己的尊严和声威，而且会带来不测的肘腋之变；对外人入内地游历和传教，也害怕引起更大的内忧等等。因此，清政府宁愿以废除关税来换取对条约的修订。总之，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对《天津条约》都不满意。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挑起战端，遭到清军痛击。英、法借机扩大战争规模，攻占了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又规定了以下几项条款：1. 增

开天津为商埠；2. 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中国人出国做苦工；3. 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4. 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5. 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彻底破产，外国侵略者终于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了其全部要求。清政府新增11个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原来的东南沿海扩张至长江流域、华北、东北和台湾。从而使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在制度上进一步瓦解，西方列强开始在政治上直接控制清政府。

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就已侵占了我们黑龙江下游地区。1858年5月，它乘清政府穷于应付英、法侵略之机，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割去中国黑龙江北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带则由两国共管。这就修改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中俄边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福以“调停有功”，强迫奕訢于1860年11月签订《中俄北京续增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所有。1861年6月，中俄双方代表又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在勘界和立界牌中，俄国又多占了我国领土。1864年10月，在俄国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清政府又被迫同其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又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我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广大地区，总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

沙皇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璦琿条约》、《北京续增条约》和其他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我们150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清政府的对外机构和政策带来了新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不仅事实上已无法避免，而且还被洋务派认识到是有益于清朝统治的事情。1861年1月，清政府依从了恭亲王奕訢等的建议，设置了第一个专管外交的机构，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般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并任命奕訢、桂良、文祥三人为“总理大臣”。这个机构的设置，标志了清政府弃其闭关政策的决心。这种新

变化的一个特点是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集中通过外交讹诈等较温和的方式彼此协商，互相合作，即实行所谓的“合作政策”；支持、援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这种变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清统治集团中坚持传统的对外政策，幻想退回到闭关锁国时代的顽固集团失势，主张“抚夷”羁縻，维持中外“合好”局面的洋务集团占了上风。洋务集团中既有在中央的当权人物如奕訢、桂良、文祥等重臣，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清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以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 三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这项政策是由英、美两国所倡导的，而为俄、法等国所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巩固和扩大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权益，以及消除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竞争，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这就是“合作政策”的实质。清政府虽然了解“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但是，它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已遭到失败，而且又忙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

1861~1862年间，英、法、俄、美等国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他们通过驻华外交官员，一方面，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势力；另一方面，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增强他们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

1865年，总税务司署在北京成立，名义上隶属于总理衙门，但实质上操纵在英籍总税务司手中，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一律由外国人充任。英国人赫德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大权，他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代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入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在赫德的活动下，清政府于1866年派总理衙门章京斌

春和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他一起去英国考察。1868年，清政府又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怂恿下，派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美访问。该团成员有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除通过帮助他国同清政府订立新约，以扩大自己的侵略权益外，还抓住了修约的机会直接向清政府勒索。自《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订立后，外国侵略者对他们已攫取的种种特权又逐渐感到不满意，特别是英国在华商人对19世纪60年代他们对华贸易仍然没有很大开展极不耐烦。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向中国勒索新的特权，以扩大他们的商业特权。1869年10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定条约》和《中英新修条约善后章程：新修税则》。英国从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获得了巨大的侵略权益。但是，就是这个丧权至极的不平等条约仍未能满足英国商人的贪欲，他们指责新约中增开的商埠太少，没有取得开矿、造铁路、架电线、内地设栈、内河行轮等权利，而鸦片商人尤其反对鸦片征税的规定。

俄国也不断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1862年3月，中俄订立《陆路通商章程：续增税则》，俄国取得了陆路通商减税的特权，造成中国税收上的严重损失。但俄国对上述条约仍不满足，1865年起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1869年4月，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把原来关于俄商运俄国货至天津，在张家口可“酌留十分之二”的规定改为“酌留若干”，又把原限于“小本营生”的俄商可在蒙古各地免税贸易的特权，扩大到所有俄商。

六七十年代，列强凭借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绕道好望角缩短了大约四分之一。1871年上海至英国伦敦与美国旧金山的电报线路接通，使西方资本主义能够迅速掌握市场行情。这些条件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扩大对华掠夺提供了便利，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被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西方列强推行的合作政策与清政府采取的妥协对外方针，曾使

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好”局面。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合好”局面便烟消云散。西方列强方面，合作政策宣告结束，开始谋求独占性的特殊利益；清政府方面，则是烽火频传，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列强不满足于一般的商品输出，而试图对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进行垄断控制。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就是由商业殖民发展为政治殖民，形成了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新浪潮。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日益明显，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速度和实力上已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各国实力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上，矛盾进一步尖锐。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发展是导致列强放弃合作政策，中国出现普遍边疆危机的根本原因。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的一些邻邦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即宗藩关系。这些国家名义上是中国的属国，要对中国称臣纳贡，君主的继位要得到中国的册封。这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封建的国家关系。但又与西方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有着根本不同。这些藩属国不仅有自己的君主，而且对内的管理是自主的，并不受中国的干涉，虽然，中国在文化上对属国有巨大的影响。经济上，各国的贡品只是一种象征，而且作为回赠，中国付出的在价值上要高出贡品好多倍，以致成为一种负担，不得不对属国的朝贡时间加以限制，这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把属国视为自己的屏障，重视的是自己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但是，在70年代前后，西方列强趁中国国势衰落之际，开始了对中国属国的侵略。他们不仅仅是要变这些国家为殖民地，而且要以这些国家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由于有宗藩关系，在这些国家遭到侵略时，中国有义务提供保护，因此，在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上，中国与列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直至战争。从形式上看，中国的介入似乎是在维护宗主权，但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交涉与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具有显明的反侵略性质。

危机首先从西北开始。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利用新

疆发生反清暴动，清政府失去控制之机侵入新疆，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伪政权。英、俄两国对阿古柏竞相拉拢，提供军火、订立商约、信使往还，企图借阿古柏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1871年俄国竟然以“代守”为名，出兵占领了北疆重镇伊犁。紧接着是东南海面。明治维新不久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羽毛未丰，便把“大清帝国”作为侵略的对象，日本也企图强订不平等条约，享有西方国家在华的种种特权，但为清政府所拒绝。1871年9月，日本同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日本没有取得最惠国待遇特权，而关于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也都是相互的。因此，这个条约同以前清政府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对照，还算比较合理。正因为如此，也就为存心侵略中国的日本政府所拒绝批准，并要求改约。在遭到拒绝后，日本便蓄意向中国挑衅。1872年，日本强封中国属国琉球为日本藩王。1874年4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派兵侵略台湾。9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泱泱的“大清帝国”竟向新兴的小国日本赔款道歉，使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更加蔑视。俄国也大肆恫吓勒索，企图乘势侵占中国领土。1879年10月，俄国强迫清政府代表崇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和一个新的《陆路通商章程》，中国以十分惨重的代价却只能收回部分伊犁领土。这个卖国条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后由于清政府新任代表曾纪泽据理力争，最后才收回伊犁，未落得十分屈辱的结局。不过由曾纪泽和俄国签订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仍丧失了相当的领土主权和商业利权。

1875年，中国西南又发生危机。英国为打通自缅甸向中国西南扩张的通道，于1874年派出一支武装勘探队向中国云南进发，英国驻华公馆派翻译马嘉理接应。马嘉理于次年2月在云南腾越与当地群众发生冲突，被打死。马嘉理案的结局是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国赔款道歉，给英国人在中国西南、西北进行侵略活动的权利。

历史刚进入80年代，日本的侵华野心又急剧膨胀。它强行同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确定了在朝鲜的特权地位，取得了同中国一样出兵朝鲜的权利，为发动甲午战争打下了伏笔。

普法战争中惨败的法国，虽元气大伤，但仍覬覦中国西南地区。它在侵略越南之后，便公然向中国发动了战争。侵略者磨刀霍霍，而清政府却依然是妥协退让、委屈求全。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后，清政府却向法国求和，最后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款》。除赔款一点法国未能如愿以偿外，其余各款，如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法会同勘定越滇边界，中国不得派兵入越等，无不是法国发动战争时就想要实现的目的。胜而求和，清政府的这种“大度”连法国人也感到奇怪。

清政府在边疆危机特别是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怯懦无能和妥协屈从，决不会消弭危机，而只会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中法战争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有关中越界务、商务的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所取得的侵略权益。英国为了同法国争夺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积极动作。1885年，挑起了侵缅战争，并公然于1886年初吞并了上缅甸，并以“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的空洞许诺换取了清政府对英国吞并缅甸的认可，此后又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实现了据缅入滇的图谋。自此，中国西南地区就处于英、法竞相交逼的险境之中。英国对我国西藏久已垂涎三尺，它在控制廓尔喀（今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今锡金）特别是缅甸后，又阴谋图据西藏。1888年，英国悍然派兵侵入西藏，清政府百般压制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再次妥协，与英国先后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承认哲孟雄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亚东开辟为商埠。这样，英国侵略势力又伸入西藏地区。这一期间，葡萄牙也来趁火打劫，1887年，葡萄牙以协助防止鸦片走私为诱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使其对澳门的占领合法化。总之，到了中法战争后，中国不仅陷入“虎狼环伺”之中，而且这些虎狼已把它们的蹄爪伸进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而这一切，又是清政府实行妥协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外交活动的主要角色已不是奕訢，而是李鸿章。奕訢由于与慈禧之间存有权力矛盾，在中法战争中被慈禧借故赶下了台。奕訢虽失势，但他办洋务的“真经”却被李鸿章全盘继承。李鸿章的对外交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妥协退让避免绝裂，力保

“中外相安”。他认为，中国根本无法与列强对抗，“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绝不能轻言战事，“凡事虑敌之要挟，不如行之于敌未要挟之前，谓其意自我出也，凡事畏敌之决裂，不如先示以我无决裂之心，俾其计无所施也”。二是“以夷制夷”，即与某国交涉时，祈求他国从中“调停”，当不得不对一国让出利权时，也将利权出让给他国，以图牵制。李鸿章称此为“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夺来维持清政府统治的苟安局面。这两个特征也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 四

清政府在列强面前的懦弱和无能，早被隔海为邻的日本看得一清二楚。日本虽是区区岛国，但却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它侵略的第一步便是攫取朝鲜这块跳板，图谋全中国。面对日本在朝鲜日益膨胀的野心，清政府不是积极备战，而首先采取的是“以夷制夷”政策，授意朝鲜政府同西方列强都订立不平等条约，幻想“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军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以后，清政府虽采取这一措施加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与影响，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仍一味迁延退让，致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的权力，形同朝鲜的宗主国。于是，日本在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之后，便借这一权力，利用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出兵朝鲜，与清政府驻朝军队形成对峙。在战争已是一触即发的时候，负责外交与军事的李鸿章在慈禧的支持下，不顾光绪皇帝速筹战守的谕令和主战官员的强烈要求，仍一意孤行，幻想靠退让与列强调停来保持岌岌可危的和局，结果四处碰壁，先是请英、俄斡旋，继而又迳向日本乞和。清政府低三下四的求和相，更助长了日本武力犯华的野心。战局一开，形势便是一面倒，结局表明“大清帝国”不堪一击，在清政府同意赔款、割地、承认朝鲜“独立”三项先决条件，中日议和。1895年4月，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次年，清政府又同日本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给

予了日本以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日本从此便在华享有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同等的特权。

就近代中外关系史来说，《马关条约》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它表明，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已经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对中国设省的大片领土的割占，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的反映，在华设厂制造特权的取得正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迫切需要。它又显示出，在帝国主义阵线中，日本已由一个小帮凶一跃而成为主角。

甲午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到19世纪末已接近完成，它们疯狂的瓜分、掠夺全球领土。到19世纪末，地球上所谓的无主土地已被占完了，只有那些政治已不完全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还未被任何一个强国完全征服。而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大清帝国”虚弱腐败，很自然地便成为西方列强争夺和瓜分的对象。

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序幕开始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后6日，俄、法、德三国即联合向日本提出“劝告”，要日本放弃割占辽东。“三国干涉还辽”决不是三国对中国有多少“慈善”，而是这一事件的谋主俄国早已把中国东北看作它盘中的一块肥肉，不允许日本染指。日本由于无力与这三国对抗，被迫接受“劝告”，但对中国却一步也不肯放松，在这年11月签订的《中日辽南条约》中，规定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将辽东赎回。1896年，俄国又利用清政府对“干涉还辽”的感激，诱骗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俄国当然不会相信清政府还有勇气“御敌”，实际目的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具有独占权益的地区。1898年，俄国即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样，东北全境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对华早就虎视眈眈，它在1897年便出兵侵占胶州湾，1898年又逼签《胶澳租界条约》，变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也不甘落后，1899年逼签《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将云南、两广划为势力范围；英国是侵华的鼻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勒索的机会，其侵占了九龙半